图书情报工作
第64卷 第15期 2020年8月

代际反哺：农村中老年人信息寻求行为形成机制探索
——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的实证研究

■ 张大伟[1] 谢兴政[1,2]
[1]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上海 200433 [2]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 福州 350118

摘 要：[目的/意义]探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村中老年人向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子辈寻求事件相关信息的代际反哺行为及其形成过程，以期为农村地区的风险信息的传播构建新路径，同时亦为政府部门进行乡村治理提供可实践的思路。[方法/过程]基于动机信息管理理论，重点关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村中老年人的不确定性差异、焦虑、结果预期和效能是否会影响他们的信息寻求行为。同时，在获得相关信息后，他们是否会表现出信息采纳和信息传递的行为。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期间，利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通过统计分析软件进行研究假设的验证。[结果/结论]通过分析发现，不确定性差异会引起农村中老年人的焦虑，进而影响其结果预期和效能，最后触发他们的信息寻求行为。他们亦会采纳和传递所获取的信息，以达到共同防疫的目的。

关键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代际反哺 中老年人 农村地区 动机信息管理理论
分类号：G206.2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0.15.024

1 引言

著名的社会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其《文化与承诺》一书中提到，“如果说过去存在若干长者，凭着在特定的文化系统中日积月累的经验而比青年们知道得多些。那今天却不再如此。”[1]米德的这一论断诠释了人类文化从“前喻文化”到“后喻文化”的转向。当前中国正在经历着以人口抚养比止降反升为标志的老龄化拐点，这也意味着青年一代正在走向社会舞台的中央，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生力军[2]。换言之，“后喻时代”已然来临，青年群体将发出更大的声音。同时，互联网的兴起为“后喻文化”的到来也提供了必要的土壤[3]，尤其是农村家庭的“数字化移民”型父母，因为接受后天教育较少，导致代际之间数字化鸿沟的形成[4]。此外，他们的科学素养和信息素养较为缺乏，这也就要求农村生源大学生从多维度进行代际反哺[5]，向父母进行数字时代的技术和知识的传递。

2019年年底，全球性新冠肺炎疫情骤然而至。从疫情初发到全面暴发，同一家庭中的青年群体及其长辈应对疫情的观念及其防疫行为经历了一系列变化。疫情初发阶段，大多数青年在家默默关注着疫情的走势，不仅做好自我防护，而且积极地向长辈普及疫情信息，努力说服长辈进行自我隔离等防护措施。尤其值得指出的是，大量的农村中老年人较为缺乏科学素养和信息素养[6-7]，造成其在疫情来临之际没有或不愿做出防护措施。亦有一些农村中老年群体无法辨别信息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造成疫情恐惧症，产生悲观和恐慌的情绪。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村中老年人是否主动向正在攻读大学的晚辈寻求信息以及这种信息反哺的效果如何尚不清晰。本文尝试弥补这一不足，以动机信息管理理论为理论框架，通过问卷采集数据，主要探讨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农村中老年人向晚辈寻求信息的机制，关注农村生源的在校大学生对中老年群体采取防护措施所发挥的作用。

2 文献综述

2.1 家庭内的“文化反哺”

在传统观念中，农村家庭内部呈现的是“长老统

作者简介：张大伟（ORCID：0000-0002-0262-7929），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谢兴政（ORCID：0000-0001-9652-1916），讲师，博士后，通讯作者，E-mail：278347285@qq.com。
收稿日期：2020-03-31 修回日期：2020-05-19 本文起止页码：194-203 本文责任编辑：易飞

治”,即亲子关系遵循着长幼原则,父辈表现出教化性权利,子辈则始终扮演着被教化者的角色[8]。20 世纪 80 年代,国内学者周晓虹引入反向社会化研究,并首次提出“文化反哺”这一概念,用以描述年轻一代将知识文化传递给年长一代的现象[9]。他认为,随着社会的急剧变迁,文化传承的内容、形式和方向均发生了一定的转变。由于代际之间在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上存在差异,既往家庭内部的互动模式逐渐被颠覆,掌握在亲代手上的绝对教化权力已经削弱,而过往仅是遵从长辈意愿的年轻一代开始展现主动意识,并表现出“反哺”行为。在互联网时代,代际之间的数字鸿沟主要表现在信息搜索、社交媒体使用等方面,这些技能成为青年群体代际反哺的重要助推剂,从而使得子辈开始全方位地对父辈产生重要影响[10]。

学者周晓虹的系列研究既证实了文化反哺在中国家庭的普遍性,也表明了新媒体时代文化反哺发生的必然性。此后,亦有众多学者展开了相关研究,强调青年群体对父母的数字反哺行为是较为常见的。如学者朱秀凌以青少年的手机使用为出发点,探讨了“数字接入沟”和“数字使用沟”引发文化反哺行为的潜在机制[11]。学者郑超月和徐晓婕以 95 后及其父母为研究对象,发现了长辈短视频使用行为蕴含的数字反哺机制[12]。学者洪杰文和李欣以山西省陈区村为例,研究了微信在农村家庭中的代际传播,指出农村家庭中微信反哺行为的驱动力和阻力[13]。学者周裕琼则发现“数字代沟”同样存在于新媒体采纳和使用方面,并且长辈对晚辈的哺育显著少于晚辈对长辈的反哺;同时,这种反哺行为更是家庭和谐关系的催化剂[14]。在她的研究中,“数字知识沟”是数字鸿沟存在的重要表征之一,这也是造成长辈向晚辈主动寻求信息反哺的一个重要动因[14]。

面对新冠肺炎这类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对其知之甚少,遑论科学素养和媒介素养较为欠缺的农村中老年人。虽然他们可以通过电视、村镇的广播以及社交媒体(如抖音、快手、微信等)得知疫情的严重性和基本的防疫知识,但是囿于科学素养和信息素养的欠缺,其无法辨别一些模棱两可信息,尤以微信和短视频中的信息最难以辨别,从而使他们极易陷入疫情恐慌状态,进而影响正常生活。在此背景下,父辈会与正在上大学的子辈进行探讨,以获取有效信息,进而采取合理的防疫措施。有鉴于此,本研究的第一个研究问题是:

RQ1: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村中老年人基于恐惧感而向其子辈寻求信息的行为形成机制是什么?

2.2 动机信息管理理论

基于不确定性降低理论(uncertainty reduction theory)、效能理论(efficacy theory)和信息搜寻模型(Information seeking model),学者 W. A. Afifi 和 J. L. Weiner 提出了动机信息管理理论(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15],认为个体寻求信息的决定是基于个人对信息所在的情境的评估和解释[16]。根据这一理论,信息管理过程始于不确定性差异,个人的情绪、可能的结果和效能评估均是重要的环节[17]。因此,信息管理过程主要体现在 3 个阶段:解释(interpretation)、评估(evaluation)和决策(decision)[15]。

本研究以动机信息管理理论为背景理论,对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农村地区中老年人向子辈寻求信息的现象进行研究。由于新冠肺炎是由一种未知病毒而造成的疾病,重症者极易丧失生命,属于人类不想面对又必须面对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往的研究中,该理论被广泛地应用于公共卫生事件情境,如:癌症[18]、生命终结[19]和性健康[20]等,并且研究结论有效地论证了影响个体信息管理过程的机制。其次,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该理论提供了一种探索农村地区中老年人向子辈寻求疫情信息的内在感知的路径,并以此探讨其在亲子关系中寻求疫情信息的可能性,这也为阐释农村代际反哺现象提供一种新视角。

2.2.1 解释阶段

根据动机信息管理理论,个体在信息管理决策过程中的初始阶段是解释,主要涉及个人对他们不确定性差异和焦虑的解释[15]。学者 D. E. Brashers 认为不确定性是一种认知状态,发生于“当情况的细节含糊复杂、不可预测时;当信息难以获得或不一致时;当人们对他们自己的知识状态或大众的认知状态感到不安时”[21]。不确定性反映了个体对特定问题的认知和评估。根据不确定性降低理论,不确定性具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具有较高不确定性水平的个体更具去寻求应对不确定性的可能[22]。但是,动机信息管理理论提出个体寻求信息的动机在于不确定性差异,而非不确定性。不确定性差异是指个人意识到他们对特定问题的不缺定性与他们的希望之间的差异[17]。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群众对该病毒的认知匮乏,但是疫情的集中暴发使得群众获取疫情信息的心情更加迫切,这是不确定性差异的根源。

过往对不确定性管理的研究表明,不确定性差异会触发个体的积极或消极的情绪反应[23]。在不同的情绪反应中,动机信息管理理论强调了个人焦虑在其

信息管理决策中的重要作用。学者 A. Bandura 将焦虑看作一种消极的生理状态,主要源于令人具有不适感的刺激[24]。学者 L. Chang 发现,大学生对性健康的不确定性差异会引起他们的焦虑感[25]。这两者之间的正向影响关系亦被学者 N. C. H. Wong 在关于个体寻求宫颈癌信息的过程中得以验证[18]。据此,本研究的第一个假设是:

H1: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村中老年人对事件的不确定性差异会引发其焦虑。

2.2.2 评估阶段

为了应对焦虑,不同的情境或个体可能做出截然不同的决策。在某些情况下,个体可能会寻求更多的信息以减少焦虑感,此外,个体也可能为了逃避焦虑而选择回避更多的信息[23]。寻求或避免信息的决策是由个体根据其在评估阶段对结果预期和效能的预测而调节的[20]。

动机信息管理理论认为,在个体的焦虑感被触发后,他们会有动机去评估结果预期和效能[26]。结果预期是指个人对成本、收益和执行特定行为的潜在后果的评估[27]。在本研究中,结果预期主要是指农村中老年人对向子辈寻求疫情信息的结果的评估。效能则是个体对自身具备能够完成某一行为能力的信念[24]。结合本研究情境,农村中老年人对自身能够完成向子辈寻求疫情信息的能力的信念被看作是效能。效能主要包含沟通效能、应对效能和目标效能 3 个维度[17]。沟通效能用于描述个人对提出问题和得到他人反馈的能力的信念;应对效能指个人对自己处理所获取信息的能力的信念;目标效能则是个人对信息源提供信息的意愿和能力的信念。过往的研究对效能这一变量的用法不一,有研究将其看作是一个一阶变量[26],也有研究将其归为二阶变量[25,28]。经过分析发现,现有研究中较多采用后者,据此,本研究将效能视为包含三个维度的二阶变量。

梳理关于动机信息管理理论的既往研究发现,消极的情绪反应会导致消极的结果预期和效能判断,而积极的情绪反应会引发积极的结果预期和效能评估。具体而言,S. R. Hovick 验证了个体的焦虑感是导致其寻求家庭健康信息的低水平效能评估和结果预期的重要因素[29];在关于高龄父母护理的议题情境中,焦虑感亦是成年子女的结果预期和效能的负向影响因素[29]。此外,根据动机信息管理理论,个体的结果预期与效能之间呈现的是正向影响关系[26,30]。据此,本研究假设:

H2: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村中老年人的焦虑会负向影响结果预期。

H3: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村中老年人的焦虑会负向影响效能评估。

H4: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村中老年人的结果预期会正向影响效能评估。

2.2.3 决策阶段

在决策阶段,个体会基于评估阶段的判断进行信息管理决策[31]。通常,拥有积极的结果预期与效能的个人更有可能成为信息寻求者。若是两个因素皆为负面评价,这类群体则更可能表现出回避信息的行为[17]。既往文献基于不同的研究情境,如父母与孩子间关于安全性行为的焦虑[32]、伴侣之间关于安全套和性健康的交流[33],均显示效能会对个人信息寻求意愿产生积极影响。由此可以推断,在新冠肺炎期间,效能会对农村中老年人向子代寻求信息的行为产生积极影响。据此,本研究假设:

H5: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村中老年人的效能会正向影响其向子辈寻求信息。

当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感知其所获得的信息具有有用性时,他们是否会采取一些后续的行为呢?因此,本研究的第二个研究问题是:

RQ2: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村中老年人向其子辈寻求信息行为的结果是什么?

2.3 信息传递和信息采纳

尽管互联网已经在农村普及,大量的农村中老年人已经成为社交媒体的常客。但是,不难发现农村社会依旧具有"差序格局"的影子[34],即熟人社会的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即使微信已经逐步进入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更倾向于将线下的熟人圈迁移至线上,进而形成微信群。在差序格局中,人们会在小范围内相濡以沫,共同防御风险[35]。换言之,当个体掌握了新冠肺炎的信息时,他们会传递信息给他人,促使他人采取防疫措施。据此,本研究假设:

H6: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村中老年人的信息寻求会正向影响其信息传递。

信息采纳主要是指个体会根据所接收的信息而接受相关的建议[36]。在本研究中,农村中老年人主动向子辈寻求疫情信息,这也意味着其对信息的感知有效性和可信度较高。根据信息采纳模型(information adoption model),信息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均是影响个人采纳信息的重要因素[37]。因此,农村中老年人会采纳源自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子辈传递的疫情相关信息,

从而采取相应的防疫措施。据此，本研究假设：

H7：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农村地区中老年人的信息寻求会正向影响其信息采纳。

2.4 研究模型

根据文献回顾，本研究发展了 7 个研究假设。研究模型建构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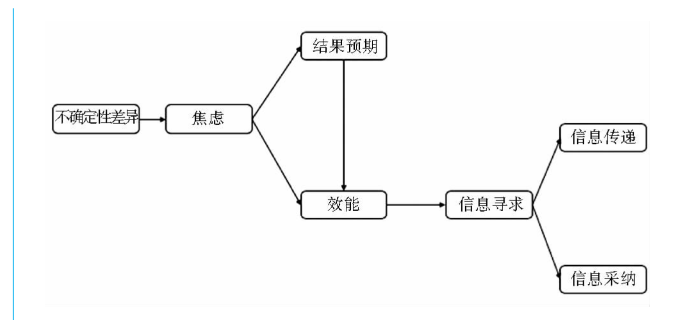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模型

3 研究方法

3.1 问卷设计

为检验所构建的模型及假设，笔者在国内外学者相关量表的基础上，设计了农村中老年人向在校大学生寻求信息行为的影响因素及对应结果的问卷。在问卷中，主要包含研究变量的题项（见表 1）和样本的基本信息。

表 1 研究变量的题项

变量	编码	题项内容
不确定性差异	UD1	我对新冠肺炎的了解比我想知道的要少
	UD2	我想知道更多关于新冠肺炎的信息
	UD3	我希望更多地了解新冠肺炎
焦虑	AN1	不知道新冠肺炎的确切信息让我感到焦虑
	AN2	关于新冠肺炎的信息没有我想要的那么多，这让我很紧张
	AN3	一想到我对新冠肺炎的了解程度和我想了解的程度之间的差距，我感到焦虑
	AN4	一想到我对新冠肺炎的了解太少，而我又迫切想知道，我就感到焦虑
结果预期	OE1	与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讨论新冠肺炎能够获得丰富的信息
	OE2	与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进行有关新冠肺炎的讨论将是有益的
	OE3	与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讨论新冠肺炎将为我的防疫提供切实可行的方法
沟通效能	CE1	我觉得我可以和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开始一场关于新冠肺炎的讨论
	CE2	我觉得我可以轻松地和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讨论新冠肺炎
	CE3	我觉得我可以坦率地与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讨论新冠肺炎
应对效能	CP1	无论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对新冠肺炎的认知如何，我都不会感到意外
	CP2	我确信我可以处理任何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关于防御新冠肺炎的想法
	CP3	我将能够完全应对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关于新冠肺炎的意见
目标效能	TE1	如果我们进行讨论，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会坦率地表达他（们）对新冠肺炎的看法。
	TE2	如果我们交谈，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不会隐藏他（们）对新冠肺炎的真实感受
	TE3	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非常愿意提供他（们）对新冠肺炎的意见
	TE4	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诚实地表达他（们）对新冠肺炎的意见
信息寻求	IS1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经常与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讨论新冠肺炎的风险
	IS2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经常与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讨论政府在新冠肺炎上采取的措施
	IS3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经常与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讨论新冠肺炎的发展趋势
信息传递	IP1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经常向别人转述新冠肺炎的风险信息
	IP2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经常向别人转述政府在新冠肺炎防御上采取的措施
	IP3	在过去的两个月里，我经常将新冠肺炎的发展趋势信息与别人分享
信息采纳	IA1	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提供的信息帮助我了解了新冠肺炎
	IA2	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提供的信息使我更容易做出预防决策
	IA3	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提供的信息增强了我做出预防决策的有效性
	IA4	我正在上大学的孩子提供的信息激励我采取预防措施

根据文献回顾,本研究主要包含 7 个研究变量:不确定性差异、焦虑、结果预期、效能、信息寻求、信息采纳及信息传递。其中,不确定性差异和焦虑的题项均源自 W. A. Afifi 等学者的研究[27]。学者 L. Chang 所提出的结果预期、效能和信息寻求行为 3 个变量的量表均可以被本研究采纳,其中,效能是二阶变量,包含了沟通效能、应对效能和目标效能 3 个重要维度[25]。信息传递是农村中老年人在信息寻求这一行为后将相关信息转达给他人的行为,这一变量的测量主要参考了学者 L. Chang 有关信息寻求的题项[25],对其进行重新编辑以符合本文的研究情境。信息采纳的题项来源于学者 Y. H. Fang 的研究,用以测量农村中老年人在信息寻求这一行为后采取的防疫行为[38]。如表 1 所示,问卷一共包含 30 个题项,每个题项均采用李克特的 7 级量表("非常不同意""不同意""略微不同意""一般""略微同意""同意""非常同意")形式进行评价。在正式问卷发放前,笔者通过微信邀请了 20 位农村中老年朋友进行预试,发现并修正了一些表述不够清晰的题项。

在人口统计学特征方面,研究调查了样本的性别、年龄、学历、单位性质、收入和向子辈寻求疫情信息的经验。同时,为验证农村中老年群体之间的信息传递是否呈现"差序格局",本研究调查了他们疫情信息传递的对象。

3.2 样本收集

由于本研究的目标样本群体为子女正在就读大学的农村中老年人,因此,笔者设定了 2 道筛选题"您的年龄大于 45 周并且来自于农村地区么?""您的孩子正在就读大学吗?"以排除非目标样本。笔者于 2020 年 3 月使用网络问卷的方式,对具有正在就读大学子女的农村中老年人进行调查。由于目标群体身处农村地区,对网络问卷的调查可能存在一定的排斥性,本研究主要透过福州市高校的辅导员将问卷的链接在 QQ 或微信群中发送给在校大学生,并强调问卷的目标样本是他们的家长,若家长有不懂之处,学生亦可使用方言与家长沟通,确保目标样本对问卷内容的理解到位,从而确保收集的数据能够反映其真实状况。

本研究一共收集了 519 个样本,排除无效样本后,有效样本共 405 个,有效率达 78.0%。如表 2 所示,大部分的样本处于 50 岁-54 岁之间,占比为 49.9%。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数量基本持平,分别占 48.4 和 51.6%。学历方面,大部分的样本仅接受高中(含)以下的教育。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68.1% 的样本

表 2 样本信息

变量	项目	频率	占比(%)
年龄	45 岁-49 岁	178	44.0
	50 岁-54 岁	202	49.9
	55 岁以上	25	6.2
性别	男性	196	48.4
	女性	209	51.6
学历	初中及以下	59	14.6
	高中或中专	281	69.4
	大专(含)以上	65	16.0
向子辈寻求疫情信息的经历	无	129	31.9
	有	276	68.1
疫情信息的传递对象	至亲和密友	382	94.3
	普通亲戚和好友	314	77.5
	远亲和一般朋友	121	29.9
	朋友的朋友或陌生人	14	3.5

有向子辈寻求疫情信息的经历。在疫情信息的传递对象方面,94.3% 的样本选择将信息传递给至亲和密友,77.5% 的样本会传递信息给普通亲戚和好友,29.9% 的样本会传递信息给远亲和一般朋友,仅 3.5% 的样本会将信息传递给朋友的朋友或陌生人。由此可见,农村地区依旧存在"差序格局"的影子。

4 研究结果

本文借助统计软件 AMOS 24.0 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样本数据。在进行数据分析前,需要对各题项数值的分布进行检验。根据分析发现,各题项数值的偏态和峰度分别处于 -0.513 -0.209 和 -1.202 --0.090,均在 -2 -2 的合理范围,表明各题项数值均具有良好的正态分布[39]。

4.1 信度与效度检验

根据学者 J. C. Anderson 和 D. W. Gerbing 的建议,验证性因素分析这一方法可以用于检验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40]。模型的拟合系数(卡方值 =656.473,自由度 =353,卡方自由度比 =1.860,RMSEA =0.046,GFI =0.900,CFI =0.952,IFI =0.952,TLI =0.945,NFI =0.902)显示模型具有良好的拟合度。

验证性因素分析的结果如表 3 所示,仅有 AN3 这一题项因其标准化载荷量低于 0.6 而被删除,其余题项均被保留。不确定性差异、焦虑、结果预期、效能、信息寻求、信息采纳及信息传递的 CR 值分别为 0.822、0.766、0.836、0.822、0.814、0.874 和 0.828,均大于建议值 0.7,说明所有的研究变量的信度良好[41]。同时,上述变量的 AVE 值分别为 0.607、0.522、0.629、

0.609、0.595、0.635 和 0.618，均大于建议值 0.5，说明所有的研究变量的收敛效度良好[41]。

表 3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

变量	项目	非标准化载荷量	S.E.	C.R.	P	标准化载荷量	CR	AVE
效能	沟通效能	1.000				0.810	0.822	0.609
	应对效能	1.051	0.108	9.772	***	0.661		
	目标效能	1.199	0.117	10.208	***	0.857		
焦虑	AN1	1.000				0.688	0.766	0.522
	AN2	1.085	0.099	10.987	***	0.765		
	AN4	1.020	0.091	11.155	***	0.713		
不确定性差异	UD1	1.000				0.758	0.822	0.607
	UD2	0.965	0.067	14.510	***	0.788		
	UD3	0.834	0.058	14.261	***	0.791		
结果预期	OE1	1.000				0.802	0.836	0.629
	OE2	0.902	0.056	15.998	***	0.797		
	OE3	0.958	0.062	15.440	***	0.780		
信息采纳	IA1	1.000				0.852	0.874	0.635
	IA2	0.872	0.052	16.617	***	0.736		
	IA3	0.895	0.048	18.463	***	0.787		
	IA4	0.942	0.052	18.093	***	0.809		
信息寻求	IS1	1.000				0.794	0.814	0.595
	IS2	1.013	0.071	14.350	***	0.807		
	IS3	0.791	0.061	12.980	***	0.709		
信息传递	IP1	1.000				0.839	0.828	0.618
	IP2	0.782	0.054	14.532	***	0.715		
	IP3	0.919	0.059	15.698	***	0.799		

注：***代表 $p<0.001$

如表 4 所示，各变量的 AVE 值的开根号值均大于变量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说明该研究中的 7 个变量之间的区别效度良好[41]。

表 4　变量间区别效度分析结果

变量	EF	IP	IS	IA	OE	UD	AN
EF	**0.780**						
IP	0.459	**0.786**					
IS	0.092	0.372	**0.771**				
IA	0.420	0.495	0.291	**0.797**			
OE	0.408	0.604	0.607	0.442	**0.793**		
UD	－0.299	－0.395	－0.299	－0.615	－0.348	**0.779**	
AN	－0.298	－0.224	－0.177	－0.570	－0.291	0.285	**0.722**

注：EF＝效能，IP＝信息传递，IS＝信息寻求，IA＝信息采纳，OE＝结果预期，UD＝不确定性差异，AN＝焦虑；对角线粗体字为 AVE 值的开根号值，下三角为变量间的皮尔森相关系数

4.2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如上分析，本研究采用问卷进行数据收集，这一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的出现[42]。在前人的研究中，Harman 的单因素检验是较为常见的一种方法[43]，笔者借助此方法对所收集的数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模型的拟合系数(卡方值＝4004.283，自由度＝377，卡方自由度比＝10.621，RMSEA＝0.154，GFI＝0.491，CFI＝0.424，IFI＝0.426，TLI＝0.379，NFI＝0.402)较为不合理，表明共同方法偏差不存在。

4.3　假设检验

模型的拟合系数(卡方值＝1139.890，自由度＝367，卡方自由度比＝3.106，RMSEA＝0.072，GFI＝0.846，CFI＝0.877，IFI＝0.878，TLI＝0.864，NFI＝0.830)显示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

由表 5 可知,本研究的 7 个研究假设均得到验证。具体而言,在疫情发生初期,疫情扩展速度极快,中老年人由于缺乏对新冠肺炎的了解,形成了其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不确定性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他们对疫情的担忧,从而引发焦虑的情绪(H1. β = 0.318,t = 4.843,p < 0.001)。中老年人的焦虑会影响他们对与子辈进行信息寻求行为的结果预期,认为与子辈的沟通并无积极的结果,因此,焦虑与结果预期之间呈现出负相关的关系(H2. β = −0.313,t = −4.851,p < 0.001)。同时,处于焦虑状态的中老年人亦会对自己的个人行为能力产生怀疑,认为自己无法与子辈进行很好的沟通,因此,焦虑会负向影响效能(H3. β = −0.212,t = −3.214,p < 0.01)。一旦中老年人对结果预期是积极的,那么他们也会建立起与子辈积极沟通新冠肺炎疫情的自我效能感,因此,结果预期与效能之间呈现出正相关的关系(H4. β = 0.374,t = 5.610,p < 0.001)。在自我效能感建立后,长辈愿意向子辈寻求疫情相关信息,以期降低不确定性差异,因此,效能会正向影响中老年人的信息寻求行为(H5. β = 0.237, t = 3.510, p < 0.001)。此外,当中老年人接收到子辈的有效信息后,他们通常会采取两种行为方式:①向他人传递信息,让身边更多的人了解新冠肺炎疫情的真实情况;②采纳信息,从而进行积极防疫。据此,信息寻求对用户的信息传递(H6. β = 0.423,t = 6.815,p < 0.001)和信息采纳(H7. β = 0.340,t = 5.696,p < 0.001)均能够发挥正向影响的作用。

表 5 假设检验结果

假设	路径	t	p	β
H1	不确定性差异→焦虑	4.843	***	0.318
H2	焦虑→结果预期	−4.851	***	−0.313
H3	焦虑→效能	−3.214	**	−0.212
H4	结果预期→效能	5.610	***	0.374
H5	效能→信息寻求	3.510	***	0.237
H6	信息寻求→信息传递	6.815	***	0.423
H7	信息寻求→信息采纳	5.696	***	0.340

注:***代表 p < 0.001,**代表 p < 0.01

5 研究启示

5.1 理论贡献

本研究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

(1)本研究以动机信息管理理论为背景理论,整合了信息传递和信息采纳两种行为,以探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时农村中老年人向子辈寻求信息和后续的信息管理行为的形成机制。在过往,动机信息管理理论主要使用于探索个体在职业生涯规划、性行为、捐献器官等方面的信息寻求,未能验证其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情境中的适用性。此外,在风险信息寻求研究方面,国内学者曾引入健康信息模型(health information model)、风险信息寻求与处理模型(risk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processing model)等作为理论背景,本研究为学界研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风险信息管理行为提供了新的适配模型和理论。

(2)本研究的结果显示,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在校大学生子辈是农村中老年人重要的信息源之一,这也再次证实了代际反哺在农村家庭中真实存在。过往大部分有关代际反哺的研究,更多地是从技术层面来凸显代际反哺的实践,如:学者周裕琼调查的是子代向亲代反哺新媒体的使用[14],学者洪杰文和李欣亦是以微信使用为研究对象来探讨农村家庭的代际反哺[13]。而本研究则是从信息层面展开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代际反哺的内涵。

(3)信息的流动体现了互联网技术冲击下,家庭权威的转移。家庭是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在中国传统社会,信息的流动伴随着教化权力由老人向年轻人流动,也就是说,“老人”是家庭里的权威,正如学者费孝通基于中国社会结构提出的“长老统治”,是一种以年龄为外显、以经验为内隐标准的权威[8]。“长老权威”可能因为文化变迁导致传统生活经验和规则不足以应付日常生活而发生变更[8],本研究的结果证明了另外一种力量的冲击,即技术赋予了具有好奇心的年轻人进入互联网的时间优势,时间经验的积累造就了“长老”变更,即权威由老人向年轻人转移。

(4)学者费孝通亦指出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呈现一种“差序格局”,即“以一己为中心,社会关系层层外推”[8]。并且,学者李默海亦认为当下的农村依然存在“差序格局”的影子[34]。这种社会结构蕴含的基本精神则是学者梁漱溟提出的“伦理本位”,即伦理关系“始于家庭,而不止于家庭”[44]。本研究透过调查农村中老年人信息传递的范围,发现至亲和密友是他们信息传递的主要对象,而普通亲友和好友则是次要对象,远亲和一般朋友则处于较为不重要的地位。由此可以证实,农村地区信息传播存在“差序格局”,并且伦理关系“不止于家庭”。

5.2 实践启示

同时,本文研究结果亦蕴含着一定的实践价值,主要体现在 4 个方面:

(1)本研究显示,65.6%的农村中老年人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具有向正在上大学的子代寻求信息的经历,表明代际反哺现象普遍存在于农村家庭之中。这为国家在疫情期间进行乡村社会的信息传播提供了一条可靠的路线,尤其在疫情期间,大量谣言充斥着社交媒体,较为缺少科学素养的农村中老年人无法很好地辨析谣言与真实信息,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其不确定性差异的产生,进而引发焦虑心理,甚至可能造成群体性恐慌。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应该充分地调动农村在校大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使他们成为风险信息传播中的中坚力量,向农村中老年人传递较为精准和客观的信息。

(2)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期间,虽然众多的主流媒体均推出辟谣功能,但谣言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农村中老年人焦虑心理的产生。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过往"智者"通常是属于长辈一代,因为经历得多,使得他们在面对一些事情时相对子辈具有更多的经验。但是,互联网这一"场域"的诞生,使得一些传统的关系得以反转,子代因掌握更多的互联网使用技能(如微信辟谣助手),从而在网络传播信息的真实性方面更具准确性。换言之,子代已经成为"智者",可以在互联网信息使用方面"反哺"亲代。这亦给政府在进行网络社会治理方面提供了新的思路。

(3)本研究验证了农村中老年人的焦虑会受其不确定性差异影响,这也意味着避免公众的不确定性差异是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关键所在。通常,不确定性差异源于对事件信息的不了解,造成这种不了解的局面可能源于中老年人科学素养的欠缺,也可能源于信息公开不足。因此,政府及媒体可以通过科普小视频等中老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提升其科学素养,同时也需要强化信息的公开化以加强他们对事件的认知。

(4)本研究再次揭示了农村地区中老年人之间口碑传播的重要性以及口碑传播的"差序路径"。尤其是当他们认为自身掌握了对亲戚朋友具有重要意义的信息时,他们会通过各种渠道对他人进行传播。有别于城市地区的"陌生人社会",现今的农村地区仍然是一种"熟人社会",他们在熟人圈子中传播信息,这为口碑传播的有效性增加了关键筹码。当然,现实的农村社会,仍然是一种差序格局明显的结构,找出农村中老年人的"重要群体",是风险信息传播和科学传播的关键一步,可以为地方政府处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5.3 研究局限与建议

虽然本文的研究目标已经达成,但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本文的研究对象仅局限于农村中老年人,没有涉及到城市中老年人。在现实的社会中,两个地区的中老年人的行为方式可能存在一定差异。建议未来的研究可以纳入不同地区的中老年人作为研究对象,以确保研究结果的普遍适用性。其次,根据专家的观点,目前新冠疫情的影响可能还未到终点,未来学者也可采用体验抽样方法(experience sampling method)进行数据收集,确保数据能够反映行为发生当下的真实状况,以发现中老年人信息寻求和信息管理行为形成的影响机制。再次,本文仅仅考虑的是农村中老年人从子辈寻求信息的形成机制。事实上,农村地区的中老年人亦会从短视频、微信等社交媒体获取相关信息,建议未来的研究对中老年人从社交媒体寻求信息的内在机理进行检验。

参考文献:

[1] 米德.文化与承诺[M].周晓虹,周怡,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
[2] 廉思.刘易斯拐点 老龄拐点 城镇化拐点 "拐点一代"命运的多重轨迹[J].人民论坛,2013(19):64-65.
[3] 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器物文明的代际传承[J].中国社会科学,2011(6):109-120,223.
[4] PRENSKY M. Digital natives, digital immigrants[J]. On the horizon, 2001, 9(5): 1-6.
[5] 周晓虹.文化反哺与媒介影响的代际差异[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2):63-70.
[6] 蒋霞美.我国老年人信息素养教育的理论导向研究[J].国家图书馆学刊,2016,25(3):28-33.
[7] 高颖,赵荣.国内外图书馆老年群体服务研究[J].图书情报工作,2011,55(S2):221-226.
[8] 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9] 周晓虹.试论当代中国青年文化的反哺意义[J].青年研究,1988(11):22-26.
[10] 李凌凌,郭晨.后喻文化:信息时代的文化反哺[J].新闻爱好者,2016(1):37-41.
[11] 朱秀凌.青少年的手机使用、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基于对福建省漳州市中学生家庭的实证分析[J].新闻界,2015(11):47-53.
[12] 郑超月,徐晓婕.数字反哺机制研究——以95后及其父母的短视频使用为例[J].中国青年研究,2019(3):12-17.
[13] 洪杰文,李欣.微信在农村家庭中的"反哺"传播——基于山西省陈区村的考察[J].国际新闻界,2019,41(10):50-74.
[14] 周裕琼.数字代沟与文化反哺:对家庭内"静悄悄的革命"的量化考察[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4,36(2):117-123.

[15] AFIFI W A, WEINER J L. Toward a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04, 14(2): 167 – 190.
[16] DROSER V A.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grief in bereaved emerging adults: a test of the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J]. South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2020, 85(1): 28 – 42.
[17] AFIFI W A, AFIFI T D. Avoidance among adolescents in conversations about their parents' relationship: applying the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J].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09, 26(4): 488 – 511.
[18] WONG N C H. Predictors of information seeking about the HPV vaccine from parents and doctors among young college women[J].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2014, 62(1): 75 – 96.
[19] RAFFERTY K A, CRAMER E, PRIDDIS D A, et al. Talking about end-of-life preferences in marriage: applying the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J].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5, 30(4): 409 – 418.
[20] AFIFI W A, WEINER J L. Seeking information about sexual health: applying the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6, 32(1): 35 – 57.
[21] BRASHERS D E. Communication and uncertainty management [J].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01, 51(3): 477 – 497.
[22] BERGER C R, CALABRESE R J. Some explorations in initial interaction and beyond: toward a developmental theory of 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974, 1(2): 99 – 112.
[23] BRASHERS D E, GOLDSMITH D J, HSIEH E. Information seeking and avoiding in health contexts[J].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02, 28(2): 258 – 271.
[24] BANDURA A. Social cognitive theory of moral thought and action [M]//Handbook of moral behavior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14: 69 – 128.
[25] CHANG L. College students' search for sexual health information from their best friends: 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4, 17(3): 196 – 205.
[26] KUANG K, WILSON S R.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 meta-analytic review [J]. Communication theory, 2020. DOI: 10.1093/ct/qtz025.
[27] AFIFI W A, MORGAN S E, STEPHENSON M T, et al. Examining the decision to talk with family about organ donation: applying the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J].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2006, 73(2): 188 – 215.
[28] CROWLEY J L, HIGH A C. Parents' information seeking during adolescent career development: a test of the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J]. Journal of applied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8, 46(3): 348 – 367.
[29] HOVICK S R. Understanding family health information seeking: a test of the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J].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4, 19(1): 6 – 23.
[30] RAUSCHER E A, HESSE C. Investigating uncertainty and emotions in conversations about family health history: a test of the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J]. Journal of health communication, 2014, 19(8): 939 – 954.
[31] TOKUNAGA R S, GUSTAFSON A. Seeking interpersonal information over the Internet: an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to Internet use [J]. Journal of social and personal relationships, 2014, 31(8): 1019 – 1039.
[32] LEHR S T, DEMI A S, DIIORIO C, et al. Predictors of father-son communication about sexuality[J].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005, 42(2): 119 – 129.
[33] CROWELL T L, EMMERS - SOMMER T M. Examining condom use self-efficacy and coping in sexual situations[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reports, 2000, 17(2): 191 – 202.
[34] 李默海. 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对于新时代乡村社会治理的意义[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20,21(1):69 – 77.
[35] 王君柏. 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的再反思[J]. 湖南社会科学,2015(1):100 – 104.
[36] TIEN D H, RIVAS A A A, LIAO Y K. Examining the influence of customer-to-customer electronic word-of-mouth on purchase intention i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J]. Asia Pacific management review, 2019, 24(3): 238 – 249.
[37] SUSSMAN S W, SIEGAL W S. Informational influence in organization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to knowledge adoption[J]. Information systems research, 2003, 14(1): 47 – 65.
[38] FANG Y H. Beyond the credibility of electronic word of mouth: exploring eWOM adoption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from affective and curiosity perspectiv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lectronic commerce, 2014, 18(3): 67 – 102.
[39] GEORGE D. AND MALLERY P. SPSS for windows step by step: a simple study guide and reference, 17.0 [M].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09.
[40] ANDERSON J C, GERBING D W.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in practice: a review and recommended two-step approach[J].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988, 103(3): 411 – 423.
[41]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 39 – 50.
[42] 邓稳根,黎小瑜,陈勃,等. 国内心理学文献中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的现状[J]. 江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18,42(5): 447 – 453.
[43] PODSAKOFF N P. Common method biases in behavioral research: a critical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and recommended remedie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3, 88(5): 879 – 903.
[44] 梁漱溟. 中国文化要义[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作者贡献说明:

张大伟:提出研究框架并撰写论文;
谢兴政:收集数据、分析数据并撰写论文。

张大伟，谢兴政. 代际反哺：农村中老年人信息寻求行为形成机制探索——基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时期的实证研究[J]. 图书情报工作,2020,64(15):194－203.

Empirical Research on the Mechanism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Among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in Rural Areas

Zhang Dawei[1]　Xie Xingzheng[1,2]

[1] Journalism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2] School of Humanities, Fuji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Fuzhou 350118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In the context of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it is significant to explore the underlying mechanism of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seek information from their children, which can build new path for the risk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n rural area, which also offers new insight of rural governance to the government. [Method/proces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t conducted the research model containing uncertainty discrepancy, anxiety, outcome assessments, efficacy, information seeking, information forwarding and information adoption.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the data was collected through the use of online survey and analysed by the statistical software.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uncertainty discrepancy can affect anxiety, and further negatively influence outcome assessments and efficacy. The information seeking behavior could be affected by efficacy. Additionally, they tend to adopt and forward the obtained information to prevent themselves together.

Keywords: public health emergency　feedback　middle-aged and elderly people　rural area　theory of motivated information management